



故園詩集
時代山脈出版社

對於呂紹光，我知道得甚少，只知道他生活於上海，對新詩有濃濃的興趣，一九三四年主編《詩歌月報》，曾參加「上海詩歌座談會」，出過詩集《紹光的詩》、《夜歸》和現在大家見到的這本《故園》（上海大時代出版社，一九三八）。——《故園》書前有趙景深的《序》，作者的《自白》和李善靜繪的呂紹光的素描像，全書有一四〇頁，收詩作五十六至八人的、四輪驅動的麵包車（van）。此地冬天冰雪多，有安全的考慮，但開着這樣的車上班，最多只一個乘客，不是費油嗎？

我們的一個美國朋友，退休教授，五年前買了一輛通用汽車公司的「豪華」，稱的轎車。這車當時已有衛星追蹤的裝置，車體寬敞，行駛很穩，因為它的底盤特別重，跟我們的農田車大不相同；但其耗油至少等於我們車的一倍。近年來，隨着全球暖化，開始有了節約用油的呼聲，美國的三大汽車公司仍然抱着它們的傳統不改——圍繞汽車發展了許多新技術，但對能源消耗的觀點不變，對節約用油不屑一顧。那位退休教授朋友持家節儉，但在買車時，根本不會去考慮油耗，是很典型的。

從一九九八年以來，美國的三大汽車公司紛紛告急，老大通用公司轟然倒下。美國有非常厚實的科技基礎，卻眼睜睜看着我們廣東的一家規模不大的公司要把電動汽車銷到美國來了。難怪寫那條新聞的記者會興嘆了：

「《故園》書前有趙景深的《序》，作者的《自白》和李善靜繪的呂紹光的素描像，全書有一四〇頁，收詩作五十六至八人的、四輪驅動的麵包車（van）。此地冬天冰雪多，有安全的考慮，但開着這樣的車上班，最多只一個乘客，不是費油嗎？」

我們自己，也從一九九〇年開始買二手車，到了一九九八年買新車，但買的都是日上學時，用多年的積蓄，買了輛福特的Excom車。那是很省油的新車，這樣可以節省修理費。那時日本車還不暢銷。

我們自己，也從一九九〇年開始買二手車，到了一九九八年買新車，但買的都是日本車。節省汽油費，是考慮的重點。我們都認為我發了財，開着大汽車。「原來，開着耗油多的大車，可以顯示自己『闊』」。這以後，我開始注意到，開着「林肯」牌子二手貨大車的，往往是收入未必高的底層人士，其中還有相當多的有色人種。有個從大陸過來的女學生，靠照顧老人和打工讀完了社區大學，要離開去聖地亞哥上學時，用多年的積蓄，買了輛福特的Excom車。那是很省油的新車，這樣可以節省修理費。那時日本車還不暢銷。

我們自己，也從一九九〇年開始買二手車，到了一九九八年買新車，但買的都是日本車。節省汽油費，是考慮的重點。我們都認為我發了財，開着大汽車。「原來，開着耗油多的大車，可以顯示自己『闊』」。這以後，我開始注意到，開着「林肯」牌子二手貨大車的，往往是收入未必高的底層人士，其中還有相當多的有色人種。有個從大陸過來的女學生，靠照顧老人和打工讀完了社區大學，要離開去聖地亞哥上學時，用多年的積蓄，買了輛福特的Excom車。那是很省油的新車，這樣可以節省修理費。那時日本車還不暢銷。

這個想法，後來因空見慣，也就逐漸淡化了。這個想法，後來因空見慣，也就逐漸淡化了。——《故園》書前有趙景深的《序》，作者的《自白》和李善靜繪的呂紹光的素描像，全書有一四〇頁，收詩作五十六至八人的、四輪驅動的麵包車（van）。此地冬天冰雪多，有安全的考慮，但開着這樣的車上班，最多只一個乘客，不是費油嗎？」

期，我遇到一位開車的二表兄弟。他不無自豪地說，「人家都認為我發了財，開着大汽車。」原來，開着耗油多的大車，可以顯示自己『闊』」。這以後，我開始注意到，開着「林肯」牌子二手貨大車的，往往是收入未必高的底層人士，其中還有相當多的有色人種。有個從大陸過來的女學生，靠照顧老人和打工讀完了社區大學，要離開去聖地亞哥上學時，用多年的積蓄，買了輛福特的Excom車。那是很省油的新車，這樣可以節省修理費。那時日本車還不暢銷。

我們自己，也從一九九〇年開始買二手

從舒蕪看中國知識分子操守



舒蕪走了，但他身後並不平靜。一位論者以當年舒蕪交出胡風的私人信件而導致建國後第一樁重大文字獄為由頭，撰文抨擊道：舒蕪雖在學術界有一定地位，但他因交出胡風的私人通信而「被釘上了歷史的恥辱柱」。

這評論，我看是說過頭了。稍知歷史的人其實都知道，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不僅有深刻的歷史背景（早年魯迅與周揚的交惡），而且也有特定的時代背景（對知識分子的改造），即便沒有舒蕪交出胡風的私人信件，類似的悲劇也可能以別樣的形式發生。何況，舒蕪當年交出胡風的私人信件，其實是在高壓下以「胡風反革命集團成員」的身份交出「罪證」。所以我認同有人在「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平反後表達的觀點：「一場悲劇落幕了，這不是個人的，而是時代的歷史的悲劇」。

惟其如此，我認同那位論者的一個意見：更應反思知識分子操守是如何喪失的。

知識分子操守是如何喪失的？答案也許有多种，我認為可從兩個角度分析：第一，中國知識分子的構成。中國的知識分子從來就不是一個整齊劃一的階層，這個階層歷來魚龍混雜，各色人等攬在其中；自古以來，中國知識分子與政治權威之間始終存在若即若離的關係，並未絕對游離於政治系統之外，這就決定了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特徵並不特別鮮明，知識分子操守實際是一個虛化的概念。在政治的壓力之下，本來就不具有較強獨立性的知識分子，必然分化為多種類型——虔誠型、苦悶型、中間型、抗爭型，有着不同的表現。

第二，中國知識分子的倫理標準。歷史告訴我們，不同時代不同環境下，倫理道德有不同的內容和標準。新中國建立，實現了中國知識分子追求民族獨立的願望，讓知識分子普遍由衷欣懽；知識分子參加土地改革等一系列社會運動，既親見了舊中國造成的人民生活的苦難，更直接體驗了人民群衆對共產黨的感恩戴德，由之增強了對新政權的認同感，並生發舊知識分子的「原罪感」。在「以階級鬥爭為綱」時期，經歷不斷的政治運動，知識分子更從身份到思想都必然經歷前所未有的變化。在這樣的背景下，讓知識分子保持獨立性、批判性，豈緣木求魚？

顯然，知識分子的操守喪失不是個別的、偶然的現象。所以我們今天回顧歷史時，才會驚訝地發現，在那個時代，能夠堅守知識分子操守者竟是如此的寥寥，梁漱溟、陳寅恪、章乃器、馬寅初、顧准、孫治方、林昭、呂梁等幾成「稀有物種」。即便率直如梁思成，為保護北京的古建築敢於當着北京市長的面憤慨地大聲斥責：「五十年後，歷史將證明你是錯的，我是對的」，但當大批判的風暴壓來之時，他除了低頭，趕緊自我檢討外，也別無選擇。也許，在那個時候，沉默是可取之策，像老舍那樣以死相抗爭也不無志氣，但那可能阻止悲劇的發生，改變整體的知識分子人格操守嗎？

前人的弱點，其實正是我們的弱點。而這弱點，從根本上不由個人品質決定，而是生長於賴以生存立足的制度土壤。正因為如此，我認為與其指責個人缺德無良，不如反思我們體制的缺陷，查找知識分子人格先天不足的根源。只有這樣，我們也許才能真正徹悟：中國知識分子現代人格的建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七情六慾裡沒有「表現慾」，但表現慾人人都有。表現慾是個什麼東西呢？

從心態上而言，想出名的人表現慾格外強，人怕出名猶怕壯，但「有名兒的感覺真好」。

為了出名，有的喜歡顯擺，喜好評頭論足，喜歡標新立異，喜歡與衆不同，喜歡罵人。想通過表現慾獲取關注度、注意力、眼球經濟。到底能不能出名，說不準——有的人真就出名了，出威名、臭名、罵名，名揚天下。想當官的人表現慾格外強，自然不是時時處處都表現，在上司面前表現企圖得好印象，在群衆面前表現企圖得好形象，在同僚面前表現企圖得好人脈，有的幹事把「記者來了沒」當作口頭禪。到底能不能當官，說不準——有的人真就當官了，還不小，他們靠表現慾「上來」，工作中處愛表現，如一條活蹦亂跳的魚，四處濺起水花一片。

許

鋒

夏威

梅家大院

梅